

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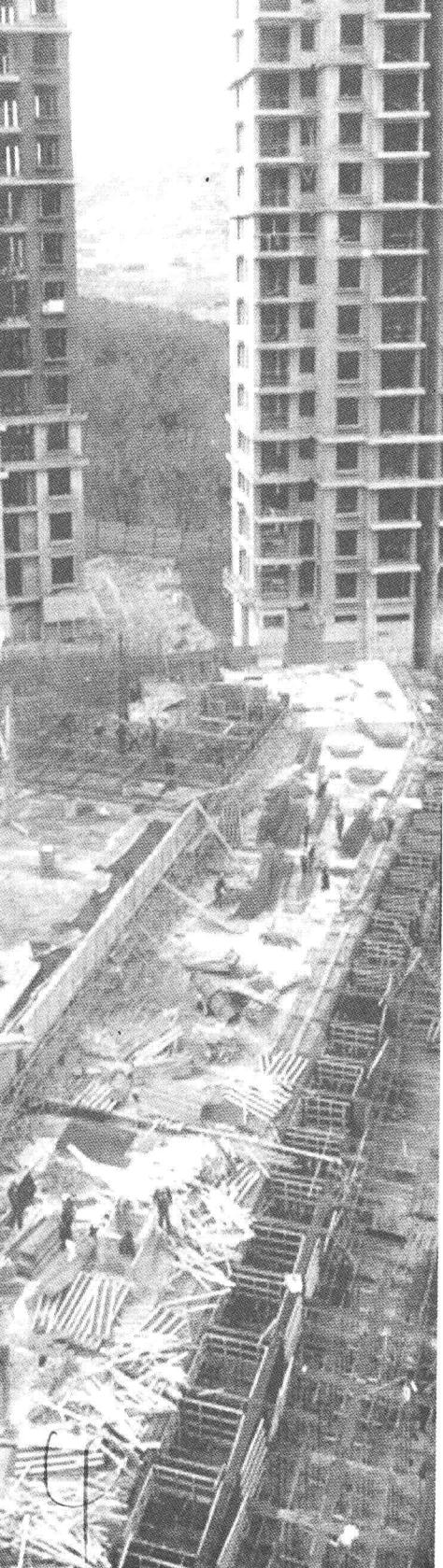
香港理工大学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主编



大工地

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

潘毅 卢晖临 张慧鹏·著



发展理论与实践丛书
香港理工大学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主编

大工地

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

潘毅 卢晖临 张慧鹏·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 / 潘毅，卢晖临，张慧鹏 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
(社会发展理论与实践丛书)
ISBN 978-7-301-09934-6

I. 大… II. ①潘… ②卢… ③张… III. 城市－建筑工程－工人－生活
－研究－中国 IV. D66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5374 号

书 名：大工地：建筑业农民工的生存图景

著作责任者：潘 毅 卢晖临 张慧鹏 著

责任编辑：丁 超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09934-6/C·057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pw@pup.pku.edu.cn

封面设计：点石坊

平面设计：点石坊

印 制 者：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2.75 印张 200 千字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6.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谨以此书献给4000万中国建筑工人。

总序

王思斌 阮曾媛琪

改革开放以来的 30 年时间里，中国经济以年均 9.9% 的速度增长，不但创造了令全球瞩目的“发展的奇迹”，也使得中国跻身世界三大经济体之列，实现了几代人梦寐以求的世纪崛起。

建立市场经济，解放生产力，是改革采用的主要发展模式。为此，国家一方面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以前的集体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在城市和加工工业区推行资本主导的外向型经济以取代原来的国有企业主导的计划经济。针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分化，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城乡居民的物质生活普遍获得了明显改善。我们今天为中国崛起，为“发展奇迹”欢呼，然而，我们同时也绝不能忽视已经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三农问题、农民工问题、城市下岗失业工人问题、环境生态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及性别平等问题等。生活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规模在扩展，从农民、农民工扩展到城市下岗失业工人，近年来又有被称作“蚁族”的工资微薄、居住窘迫的大学生群体被卷了进来。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一小部分垄断大量生产资料，占有大量物质财富的人群，他们率先暴富，却没有带动广大劳动者共同富裕，而且在事实上挤压其他劳动者的生存空间，成为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严重障碍。收入两极分化的问题，正成为中国发展模式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就清醒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并不比不发展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1364 页】，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地对待他的睿智之言。

更进一步思考，以上提到的问题与其说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

毋宁说就是“发展”本身的问题，是我们长久以来对“发展”的片面理解造成的问题。很长一段时间里，“发展”被等同于简单的经济数据增长，尤其是总量数据上的经济增长，而很少顾及“发展”是否更加均衡持久，是否惠及更多人群，是否提升所有人的生活处境。如果这样片面理解“发展的奇迹”，那我们如何去看待一部分弱势地区、弱势人群“没有发展”的事实？中国经济的蛋糕越做越大，社会财富急剧增长，但是所有人群分食蛋糕的机会却并不均等，弱势群体通过“涓滴效应”分享发展成果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少。要纠正改革中出现的这些偏差，就必须正视“发展”本身的问题，改变先前对“发展”的片面理解，树立并实践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弱势群体缺乏社会保障等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

本套丛书记录了中国发展大背景下各种人群日常鲜活的生活经验，丛书的作者们希望藉这些人群的遭遇帮助我们重新反思发展本身存在的问题，打开发展的丰富可能性，积极推动一种更加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观。

目 录

导论：建筑工人阶级的形成 /001

第一章 农村改革与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

- 从北京到尧村 /020
- 资本主义的危机与新自由主义 /021
- 中国市场化改革 /023
- 农村改革 /025
- 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困境 /028
- 比较优势论 /033
- 国家的退出与介入 /036
- 发展的必然代价？ /038

第二章 地产资本主导下的城市中心主义

- 从尧村到北京 /042
- 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 /043
- 资本向空间转移 /046
- 地产资本的兴起 /048
- 城市消费主义 /053
- 欲望的生产与新经济主体的打造 /056

第三章 半无产阶级化与身份政治

- 半无产阶级化 /062
- 劳动力再生产中的国家缺位 /067
- 身份政治 /074
- 中国特色的“圈地” /080

第四章 历史转折下的建筑业分包劳动体制

工地上的劳动体制——分包劳动体制 /090

分包体制的根源——生产决定论？ /093

社会主义时代的建筑业与建筑工人 /094

市场化下的分包劳动体制 /097

包工头：分包劳动体制的核心 /100

资本弹性积累与工资拖欠之源 /103

掩盖剩余价值与掩盖劳动关系 /111

第五章 路在何方？——建筑工人的阶级体验和阶级情感

“劳动者创造了宫殿” /116

主体体验 /119

没有尊严的生活 /126

21世纪的“包身工” /132

异化体验 /150

社会主义年代的主体感情 /154

今天的主体情感 /158

路在何方？ /164

第六章 阶级的回归：从自在走向自为的摸索

阶级分析的本土社会学意义 /169

阶级与阶级形成概念 /172

中国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 /174

与资本的对立 /175

工人行动的政治化 /179

在抗争中走向联合 /184

建筑工人的阶级形成 /188

参考书目 /191

致谢 /198

导论：建筑工人阶级的形成^[1]

2008年元旦，北京已是寒气袭人，轰隆隆忙活大半年的工地大多已经停工。京郊一处简陋的工棚中，五十出头的建筑工人老徐却仍在焦急地等待着包工头发工资。当我们在寒冷中围拢着他的时候，老徐打开记工本，上面清楚地记载着他过去280天的辛苦工作，活儿一天都没有停，而工资一天也没有发过。远在深圳打工的年轻妻子一天一个电话，询问他回乡的消息。夫妻俩约好，只要老徐拿到工资，就同时从祖国的南北出发，在湖北老家的火车站汇合。

能够来到北京打工，为首都建设做贡献，老徐感到非常骄傲。现在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尽快拿到工钱，去天安门广场看一看，去奥运场馆外转一转，了结自己的夙愿。然而，包工头一天推一天，老徐等了十多天还是没有拿到工资。无奈之下，老徐只好失望地离开北京，回到他的农村老家。

老徐是个好熟悉的人，他的故事让我们习以为常，两年来，我们在北京的工地上遇到不下几百个象老徐一样的打工者。可老徐的故事又好象带点底层不应该有的浪漫，比他年轻十年的妻子在祖国的南方等待着他，一年一度的相聚，使老徐又思念又焦急，让我们对底层的故事放出内心的微笑，但与此同时又倍感辛酸。

[1] 本项研究受到以下课题的支持：香港研究资助委员会（HKRGC）研究项目“一个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对华南地区宿舍劳动体制下集体行动的研究”（2007—200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民工群体的阶层形成和身份认同”（批准号06CSH009），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课题“新一代农民工的生活空间：阶级与公民意识的探索”。作者要感谢乔·昂格（jon Unger），陈安（Anita Chan），黛博拉·戴维（Deborah Davis）和严海蓉（Yan Hairong）对本书早期版本的评论意见。刘静、李大君、刘晓红、周丽娟、李庆素、孟小强、连佳佳、李丁、张勘颖、朱倩、王敦猛等人为田野调查作出了贡献，连佳佳参与了本书最初阶段的写作和讨论，本书作者对他们表达万分的谢意。

大工地上的农民工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不但成为世界工厂，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地。在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建筑工地上，有千千万万像老徐这样的农民工，他们建设了北京、上海这样让世界瞩目的国际都市，创造了今天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让很多中国人都陶醉在大国崛起的梦幻中。2009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官员表示，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建筑市场，目前的建筑量占到世界的一半还多，其混凝土和钢筋的消费量分别占到世界的一半和1/3。^[1]轰隆隆的大工地为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近年来，建筑业连同房地产业一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以2008年为例，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10%。^[2]在后社会主义的中国，城市空间成为展现国家和资本力量的舞台（罗丽莎，2006）。一幢幢堪称世界之最的大楼拔地而起，一座座国际化、现代化的大都市日新月异。以我们身在北京为例，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城区规模从三环路扩张到五环路，并正在朝建设中的六环路膨胀，所有这些，都经常被看作是21世纪文明社会到来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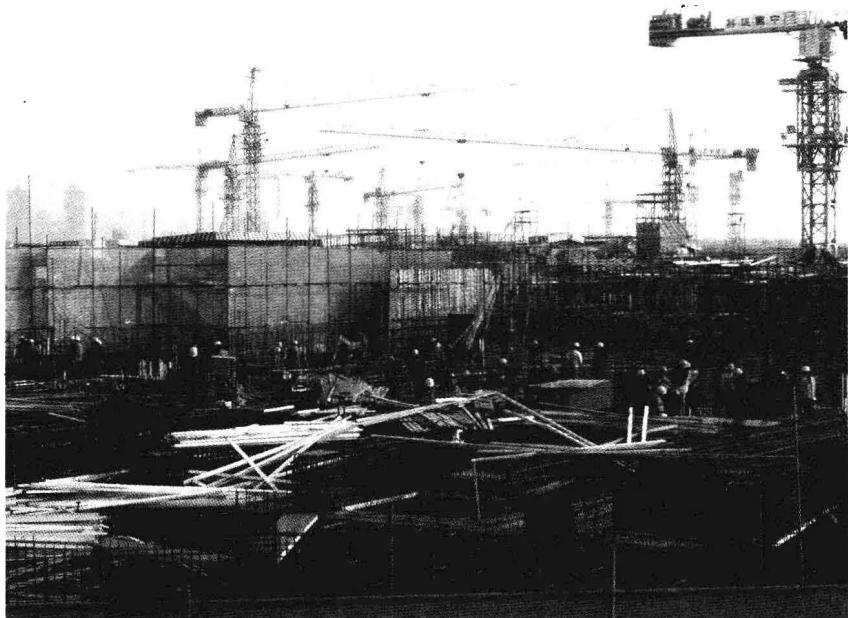
当我们陶醉于光鲜的城市面貌，叹服于资本改变世界的魔力时，不经意间会遭遇这样一群人：他们带着黄色安全帽，穿着破烂的衣服，扛着铁锹，满脸的汗水和尘土……他们是都市的建造者，又被建造出来的都市所遗弃。游走于繁华的都市与轰鸣的工地之间，高度文明社会的面纱瞬间脱落，这些被遗弃的建筑工人带我们回到冷酷的现实。

根据2009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2008年末，全国共有建筑业从业人员3901.1万人，其中，施工现场操作人员基本是农民工。在这个目前公认的最脏最累且具有高危险性的行业中，绝大部分建筑工人至今连一份劳动合同都没有，只能依附于大大小小的包工头，忍受恶劣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没有保险，缺乏安全防护措施，超长超强度的劳动，吃住条件极差，随意克扣工资，甚至有时候辛辛苦苦一年下来连血汗钱都拿不到。他们俨然成为21世纪的新形态的“包身工”。

这样的一批人，日复一日地工作在城市建设的最前线，而又生活在城市文明的最边缘。城市文明的两面性及其背后的发展的吊诡，引发了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网站 http://www.cin.gov.cn/l djh/j sbfld/200809/120080924_177077.htm。

[2]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讲话 http://www.hsw.cn/news/2008-03/17/content_6865658.htm。



北京常见的一个大工地上工人们正在紧张的忙碌

我们对发展问题的思考，带领我们走进建筑业农民工大军的生活世界。在将近两年的田野研究中，在“参与式行动研究”过程中，我们与建筑工人一起，体验着他们的焦虑、义愤、无奈甚至绝望的心情。不同的年龄、籍贯、工种、性别、民族、技术水平，以及每个人鲜明的个性特征，构成了这个群体的复杂性，但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建筑行业的包工制度下，他们却遭遇了共同的命运。

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经济改革

老徐悄悄地离开北京，促使我们去思考当下中国的现实。像老徐这样年龄的人，伴随着新中国走过了半个世纪的历程，他经历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代。他的经历折射出近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吊诡。在一个据称告别了贫穷、走向富裕的年代，他还是一样的赤贫，一样的一无所有。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的国门重新打开，再次接受世界经济体系的挑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战后的黄金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另一方面也潜藏着资本主义本身不可克服的危机，急切寻找摆脱危机的突破口。以撒切尔、里根上台为标志，西方国家被迫告别高福利高保障社会政策的时代，全面转向新自由主义，大规模推行私有化，开始了一个市场导向的新时代。东亚新兴经济体抓住西方国家产业转型的契机，吸纳欧美跨国流动资本，以出口导向型产业发展模式参与到世界经济体系中，成就了“亚洲四小龙”阶段性的崛起（汪晖、许宝强，2001：9—10）。当此之时，中国国家政策也开始急剧转向。新领导班子“拨乱反正”，结束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过去的发展模式被归结为“极左路线”，受到彻底的批判。面对西方世界的繁荣表象，以及东亚国家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社会精英对发展表现出急迫的心情，对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模式产生严重质疑，痛感共和国错失了前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方兴未艾的经济全球化引发社会精英集团对中国球籍问题的热烈讨论。

在彻底否定过去之后，中国应该走向何处？社会精英不约而同把目光投向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看来，美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国家，美国的模式是最成功的模式。一批知

识分子走出国门，踏上了海外求学的道路。在欧美的大学里，他们接受了当时西方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并把它当成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将新自由主义带回中国，使之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主导思想。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经济增长缓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最根本的原因是在公有制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全面的控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公有制被简单地等同于平均主义和大锅饭，缺少激励机制，只能滋养懒人，计划经济体制被认为过于僵化，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在他们看来，只有市场化才是中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市场这支无形的手能够自发调节供给和需求，优化资源配置，实现效率最大化。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能够激发人们的积极性。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市场还作为一种解放的力量，将人们从国家的控制下解脱出来，带给人们更多的自由空间。然而吊诡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信奉市场力量，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经济，但他们所要推行的改革恰恰是依靠国家这支“有形的手”推行的。

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包产到户，并维持土地的承包权长期不变。包产到户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产量，短短几年农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改革所释放的生产力很快到了极限，包产到户的改革很快就遇到了瓶颈，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没有办法实现生产力水平根本性的突破，农民对公共事务缺少参与，集体经济时期兴修的农田水利等公共设施逐渐荒废。农业的收入越来越难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随着城乡分割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开始形成中国特有的民工潮。包产到户的改革原本是为了解放农村的生产力，结果却把农村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劳动力一步步逼进城市。

1980年代中，改革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对国营工业企业进行改革，逐步“放权让利”，实行承包制，给企业更多的自主性，打破计划经济模式，引入市场机制，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用市场这支无形的手去调节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则大力扶持私营经济的发展，推行发展民营经济的策略。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又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

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破铁饭碗，告别终身制，实行劳动合同制，作为国有企业的单位不再负责职工的社会福利，国有企业从追求社会效益转向追求单一的经济效益，一方面导致大量国营工人的下岗，另一方面企业开始大量招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廉价劳动力。这样一来，一种具有资本积累性质的市场经济便逐步形成。

农村与城市的改革，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分割更为严重。一方面大量农村劳动力不得不进城打工，成为新兴工人阶级主体，另一方面国家依然维持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行政壁垒，制造出“农民工”这样一种特殊的身份。“农民工”象征着一种时代的“创伤”，而这种“创伤”让农民工难以完成向工人身份的转变，为资本肆无忌惮地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提供了社会基础。

改革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保持了接近10%的高速增长，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2010年底，就将超过日本。资本和政府都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同时也让中国从一个相对平均主义的国家迅速变成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1]地产商的财富神话同几千万建筑工人的处境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这一后果的极好的注脚。

城市主义与消费革命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造就了精美的城市。2004年统计的全世界最高的十大建筑，中国大陆以上海金茂大厦、广东中信广场、深圳地王大厦占据三席。据最新报道，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将与金茂大厦比邻而建，争锋世界之最。今天的北京、上海已经实现了和世界接轨，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宽阔的马路、闪烁的霓虹灯、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人流车流，处处展现着现代都市无尽的繁华与活力。鸟巢、水立方、大剧院、中央电视台，这些充满现代和后现代元素的建筑成为城市亮丽的风景。繁华的大型超市、购物广场，琳琅满目的商品，将人们带进一个

[1] 目前世界上衡量贫富分化最通用的指标是基尼系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迅速扩大，1981年，全国居民吉尼系数为0.28，属于“相对平均”水平，而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0.41，超过0.40的国际警戒线，并且继续迅速扩大。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数据，2006年更是高达0.46，基尼系数的扩大已经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物质丰裕的时代，一个消费的社会。毫不夸张地说，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现代生活的样板。

在消费社会里，人的欲望得到空前的激发。消费是现代资本循环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用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理论为人们的欲望合法化，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改革年代，消费因其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个人的事情，“鼓励消费”上升为国家的战略。因为与国家和资本内在利益的契合，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主义成为事实上的新意识形态，也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推动力。大众传媒将消费社会的海市蜃楼景观覆盖到每一个偏远的角落，建构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借助电视、电影等强力媒体，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图景迅速突破地域、城乡乃至阶层界限，成为广大农民的美好生活的典范。消费主义已经不再单单是城市人的事情，农民也被吸纳到这场消费革命大潮之中。

在社会精英看来，城市代表着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乡村作为传统农业文明的代表，成为落后与原始的象征。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后，国家开始推进城市化，城市被赋予现代文明的意义，而农村则成为问题的同义词，城市化被看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这一逻辑下，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对立进一步加剧了，在经济差距之上具有了文明差距的含义。追求城市生活就是追求现代文明。农村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被彻底否定，农村成为现代性的他者。在农村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再也不愿重复祖辈的生活，他们向往城市生活，初中或者高中一毕业就义无反顾地奔向城市，开启了世纪之交中国式的自我驱动的“圈地运动”。

然而当他们从农村走进城市的时候，却发现现实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当城市的精英正在享受消费革命的盛宴的时候，普通大众却被排斥在外，而农民工更是无缘参与其中。消费的社会分层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显示出阶层的区隔，这种区隔不仅体现在社会意义上，还体现在空间上。在城市变得日益精致化的同时，城市的空间也开始分化。几千万的建筑业农民工亲手打造了城市，却没有办法为自己在城市找到一个合法容身的空间。当一项建筑完工的时候，也就是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劳动产品被彻底地分离，甚至连亲眼看一看的机会都没有。农民工的身份让他们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对于城市美好生活，他们只能远远地观望。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老徐常年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而他的妻子却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工厂工作，夫妻俩天各一方，像牛郎织女一样一年才能碰一次面，所以才会有本书开篇提到的浪漫约定：两个人相约年底在老家的火车站碰面，一起回家过年。老徐的故事既让我们感到有趣，同时更让我们感到心酸，促使我们去思考今天中国的农民工所处的生存困境。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家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家庭被比喻为温暖的港湾，家人团聚是中国人幸福的源泉。然而在当今的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像老徐一样离开自己的家庭，开始了无根的漂泊。据统计，中国的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两亿多^[1]，在每一个外出的农民工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被撕裂的家庭。他们在忍受艰苦的打工生活之外，还要饱受思念的煎熬。

从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来看，今天中国所出现的大量城乡人口流动并非史无前例。18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亚洲四小龙，以及现在的南亚与拉丁美洲，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历工业化的某个阶段都出现过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量转移的现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转变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所谓无产阶级化，是指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转化成为“自由”劳动力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空间的转移和身份的转变，劳动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逐渐扎根，形成新的社区，同时也从农民转化成为工人。无产阶级化所造成的后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这些（无产阶级化的）工人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贯穿于世界历史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主导的结果，并主要表现为市场力量的作用；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特殊性在于，其农村人口在进入城市成为资本积累和循环的一个环节的同时，已经因为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被打上了低人一等的农民工身份烙印，而这恰恰有利于劳动剩余价值的最大榨取。换言之，这种无

[1] 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截至2008年12月31日，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542万人。其中本乡镇以外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62.3%；本乡镇以内的本地农民工数量为8501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37.7%。